

生活本身是一个运动着、时刻在进行的过程,拥有感受力的人置身其中,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担忧,这决定了人会有关怀、有忧虑。处境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指人所处的境地、境况,多指不利情况,主要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主体的状况与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处境,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人在自己的任一处境中,都会有所关怀有所忧虑。本项目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处境。伦理学视域下的处境指人与人在一定的状况、境遇中的相处或相互对待;处境作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也指主体在世界上遇到的困难、得到的帮助和付出的努力。处境伦理则指人与人相处、相互对待和共同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规范。

■ 处境概念:理论上的丰富性和实践上的复杂性

从学术界的现状来看,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也在自我的处境中充满关怀与忧虑,但与此相关的论题多是零星的感悟或片段似的论及,既没有专门著作,以处境伦理为关键词在CNKI上搜索,也少有专门的研究文章。这种理论空白与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是不相称的。本研究第一次尝试性地提出并论述“处境伦理”这个概念,同时认识到把人的处境纳入伦理学研究的领域是理论深化的需要。从伦理学角度反思或审视处境,有助于人们思考如何应具体处境而让生活变得合理、善好、有益和幸福。人们的道德判断和思考如良知、正义感、同情共感、仁爱等,都是根据处境来选择和回答的。针对上述论题,本项目在分析和比较各种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建立一种处境伦理的可能和意义。为此,弗莱彻的“境遇说”、弗洛姆的“情境说”、阿伦特的“境况说”、萨特的“处境说”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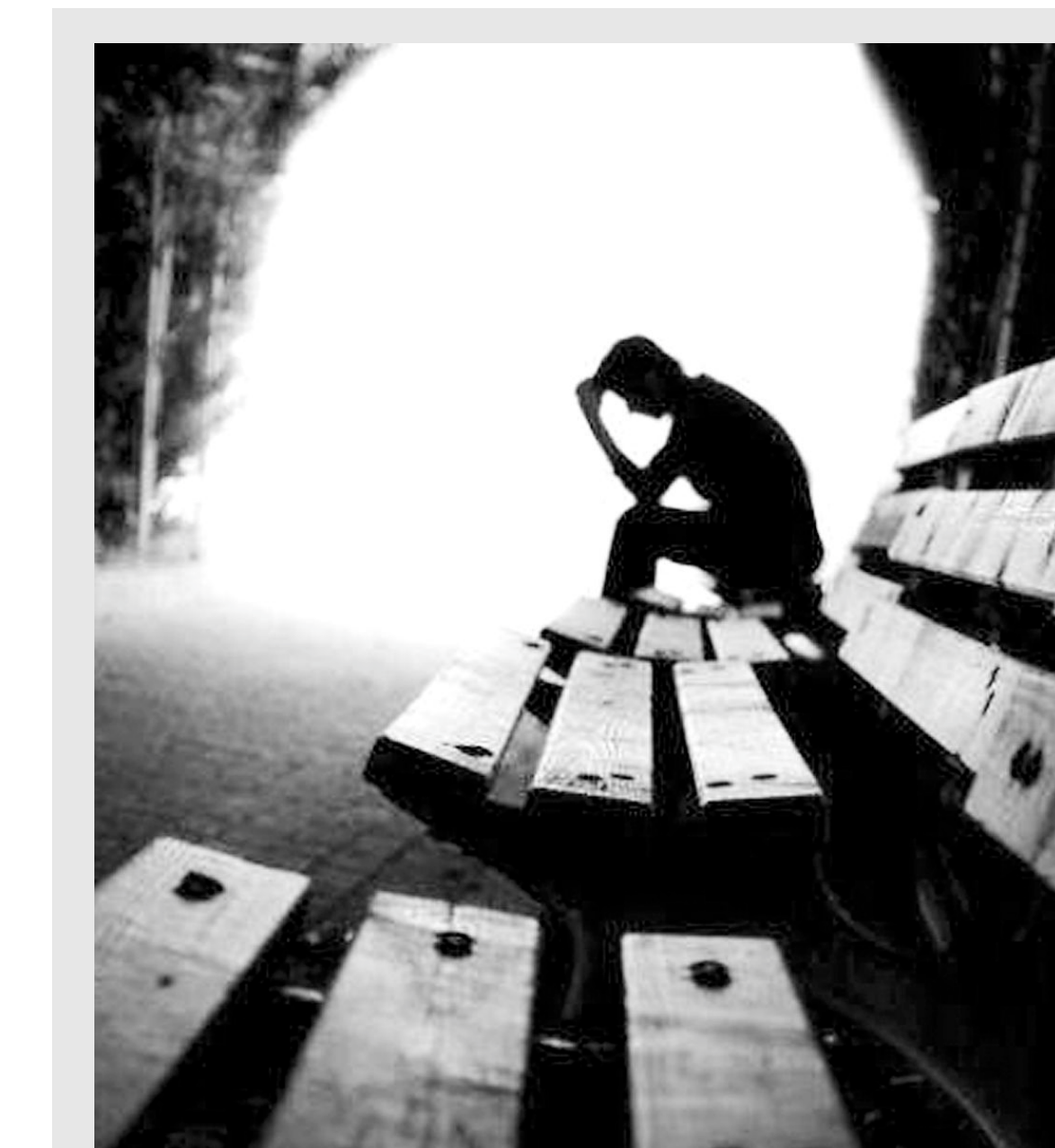
每个来这世上走一遭的人存在于一定的处境中,各有不同;不同的处境都有其意义,也不尽相同;但为了摆脱、改善、提升某一处境,人必须充满意义地选择和行动,这是处境伦理提出的一个基本设想。对每一个人而言,处境是具体的,生命的意义予取予求。如果要客观角度来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的处境及其生活,要有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或解释模式。梳理以往的相关学说,有四种理论提供了进行处境伦理研究的学术基础。

第一种理论是基督教神学家弗莱彻的“境遇说”,他关心的是“我们爱什么”。针对西方科学发展所产生的诸种道德问题,弗莱彻呼吁建立一种新道德,即境遇伦理学。他认为判定一切事物正当与否完全取决于境遇,不能仅从现行的道德原则和已有的伦理学概念出发。境遇伦理学旨在达到一定背景下的适当,是一种事关选择和行为的伦理学。弗莱彻强调依据经验、重视事实,对复杂性和多样性极其敏感。境遇伦理学成为做决定的道德,并把人视为中心,以爱为唯一的最高原则,弗莱彻宣称:“爱的行为是唯一可以得到允许的行为。”(《境遇伦理学》)

第二种理论是弗洛姆的“情境说”,他关心的问题“我们想要什么”。弗洛姆相信“人一定是为自己的人”(《为自己的人》),所以他主张伦理行为规范的源泉应当是在人的本性中得以发现,信仰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是舍弃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自爱,是肯定真正的人自身。他深知:“人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生命之爱》)正是因为他处于这样的情境,所以弗洛姆认为人的定义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其思想、理性,人会因此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即使身陷困境,人会以行动对困境做出反应。

第三种理论是阿伦特的“境况说”,她关心的是“我们正在做什么”。所以她总是呼吁:“从我们最新鲜的经验和我们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境况。”(《人的境况》)阿伦特相信人是被处境决定的存在物,她主张从积极生活所包含的三种根本性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来了解人的处境,她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境况做了最基本的区分,因为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她认为人虽然总是生活在被给定的处境中,同时也创造自己生活的处境。

第四种理论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处境说”,他关心的是“我们没于世界的态度”。他这样定义“处境”:“我在世界上能够碰到的障碍、我能够获得的帮助,这些就是我们称之为处境的東西。”(《存在与虚无》)处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萨特的领会很深刻,他看到了境遇的具体性,意义问题迫在眉睫,就是说,人总是处于某种预先存在的境遇中,为了摆脱某种处境,必须行动。他指出不可实现的东西代表着处境的反面,强调了在对外处境的观察中,人的存在被归结为作为,即行为或举止构成一个统一体。萨特作为存在主义大师所关注的,从来都是一种境遇中的自由,他综合了处境与自由、责任等概念的关系,相信人是绝对自由的并对自己的处境负有责任。同



以关怀或忧虑看待处境

■ 成海德

现代生活带来了人们感受的变化,造成个体的孤独感、厌倦感、人际之间的陌生感、疏离感,公众情绪中的迷惘感、沮丧感;在意义缺失的空虚中,人容易走向放荡和肆无忌惮,也可能滑向绝望和不知所措。“十分冷淡知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相信人总是会关怀和忧虑自我及他人的生命与存在,这就是处境伦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所在。

时,人永远只在处境中才是自由的。

上述诸种理论,尤其萨特的“处境说”是本项目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为本项目从伦理学视角研究处境提供理论基础。另外,从现实来看,加拿大哲学家泰勒说过,“当我们作为怀着欲望的存在者,充分感知到自身的脆弱与悲怆,我们带着羡慕与敬仰仰望立法的力量。”不仅如此,更多的时候,我们还如康德所言,对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更充满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这正是处境伦理提出的人性根源的心理基础。这样说来,处境伦理的研究永远只会停留在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有关生活、有关人生、有关自我的实践智慧被运用。

就现代社会人的状态和生活的复杂性而言,很难用一个或几个词来进行概括,但是处境这个概念可以容纳千变万化的内容,可以被理解为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所有的一切,从物质的存在到精神的拥有,还包括情感的体验。在处境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内,有个人独处的问题,也有与他人共处的;有自我认识的问题,也有如何看待和建立与他人之关系的问题;有道德冲突的问题,也有道德权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处境伦理指人处于一定的境遇,基于是非善恶的判断而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处境伦理学则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及其解决办法和途径。以实践活动去改变外在事物,是人的特性也是人的能动性。人在处境中就像黑格尔写到的那个小男孩,他把石头抛在河水里,用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他自己活动的结果。这时候,人改变了被处境规定的属性,也成为了处境的生成者和创造者。

■ 人在自己的处境中关怀何物忧虑什么

人的处境有一般处境也有例外处境,前者是常态,后者是指道德冲突的状况,即人们如何进行道德权衡,如何看待、认识、接受或改变自身的处境。伦理学关注常态,关心粮食、蔬菜,关心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人们如何从明天或今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而讨论的重点常常是指后一种情况,那些道德生活中让人左右为难的情形,也是本研究的主题。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有其特殊性也会有其共同性。在伦理学视角下考察人的处境,人们

关怀尊严、自由和幸福,人们忧虑孤独、孤独、焦虑,前者被归结为积极生活的范围,后者则被视为消极生活的内容。这赋予了人对处境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意义。人作为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其处境中毫无疑问地包含了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不仅如此,处境伦理还要研究一个时代的各种外在条件,如何参与影响到个人的人生处境形成和生命感受之中,使人很真切地体会到生活的意味;同时,人拥有意志自由,是处境的决定者,可以选择做什么人和怎样度过一生。

首先,从全球化、资本化与城市化的趋势论及人的当代处境。当代社会就客观环境而言,以工业化、现代化和技术化为标志,现在更是进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理解人类的处境,时代性是其中心一个重要因素。黑格尔曾经变化的时代里所有的一切,从物质的存在到精神的拥有,还包括情感的体验。在处境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内,有个人独处的问题,也有与他人共处的;有自我认识的问题,也有如何看待和建立与他人之关系的问题;有道德冲突的问题,也有道德权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处境伦理指人处于一定的境遇,基于是非善恶的判断而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处境伦理学则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及其解决办法和途径。以实践活动去改变外在事物,是人的特性也是人的能动性。人在处境中就像黑格尔写到的那个小男孩,他把石头抛在河水里,用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他自己活动的结果。这时候,人改变了被处境规定的属性,也成为了处境的生成者和创造者。

其次,阐述值得过之生活的内容,即人生应当拥有尊严、自由和幸福。尊严是指个体和共同体的存在所享有的不被侮辱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包括尊重与自尊。尊重是对别人敬重的情感,自尊则是对自己敬重的情感。自由在人形成自我理解的过程中,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是免除限制和自我决定的权利。人们毫无例外地地关心幸福和追求幸福,幸福是人对外处境的满意心理感受和客观状态,是考察和建构处境伦理的重要内容。尊严、自由和幸福都是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内容,生活正是因为充满美好而值得期待。正是积极的生活内容表现为人们相信其中有更高的东西每时每刻都把人的生命引向美好。在这种积极的生活状态中,人会爱这个世界,爱其拥有的生命及经历的生活,并以责任和理性去爱这一切。

再次,论述消极生活的内容:人的异化、孤独和以焦虑为典型形态的各种心理不适征候。所谓“消极生活”是

指现代人生活所面临的与积极背离的趋势,这是难以摆脱也难以避免的,还有伴随性的厌倦。在人的处境中清理出属于消极生活的因素,是现代人最为迫切需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其中异化指人与自我的分离,是程度较轻的自我疏远,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矛盾,也积累了潜在的社会冲突,是要加以抑制和克服的趋势。孤独指人丧失与他人的关系,也丧失了自我实在性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人失去了被看到和听到,也没有对他人的看到和听到以及更多,这些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更普遍的大众孤独现象。再就是焦虑,它是对想象中的危险不相称的反应,包含着无能为力、无力自主和非理性的情绪体验。这些消极性的体验带来的厌倦则是更大的危机。在现代生活的天空中,密涅瓦的猫头鹰飞翔在暮色苍茫中,因为生活的色调正越来越灰暗。

■ 改善处境:我们可以做什么

在人们看来,生活尽管可以给人各种各样的快乐,比如咖啡、游戏或自己的眼睛会让人们重新看到世界和生活充满各种各样的悲剧和痛苦。建构处境伦理就要针对由此产生的心理不适征候提出调适的方案,包括由于新的社交网络的出现,对于“群”与“俱乐部”的城市交往模式的分析与认识;提倡遵循简单原则生活,投身各种有益的生产劳动,保持情绪上的无怨,最重要的是由爱引导人生。

首先,从社交网络来说,城市生活中“群”和“俱乐部”兴起。随着网络的影响日益加强,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城市生活中“群”和“俱乐部”兴起,为现代人提供了交往的新模式,也提供了新的意义源泉。“群”具有电子产品被广泛拥有时代的亲切性,它揭示了人不能在人群之外生活的事实,这一层意思在今天被特别突出和强调,出现了各种各样正在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和趋向的“群”。“群”是新的社会结合方式。群的功能性划分说明,人们保持个体性、独特性与其社会性是可以同一的。人作为共同体中一员的身份与其追求自我实现的目标并不冲突。共同体意味着人们彼此认同、同情、友爱、帮助这样一些构成个体支持系统的基本态度。现代生活中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都市生活的疏离了农业时

代所塑造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人们以更大的紧迫性归依各式共同体,它许诺人们在这里的归属感、神圣感,有助于生成认同、精神及情感的依恋。歌迷会、演唱会、运动会这些现代狂欢仪式显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渴望在一起的感觉。人们在里面短暂地相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临时的相互接纳感,并寻求情感的一体性和强烈性。相比较“群”这种聚合方式的虚拟性,俱乐部则更具有现实感,是社群观念的现实表达形式。在都市的小俱乐部或类似的活动团体中,会员可以获得类似乡村社群那种熟悉亲切的感觉,这是对亲密关系缺失的一种有益补充。人们一起消磨时间共度岁月,还可以互相帮助,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支持系统。但是和乡村那种无所不知的熟人关系又有不同,人们对私密性有更高要求。

其次,改善处境的简单原则包括劳动方法和情绪上无怨。面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要提倡遵循简单原则生活,即奉行朴素的生活理念,用简化的方式看生活。人认同自己的处境并归属于它,要奉行一定的行为准则或原则,这样就会产生更多和更大的利益一致,使相处既成为一种关于存在的形式、内容,也是其本质。原则是关于人如何行事和应当如何行事的一般理论。所谓的简单原则,是指奉行朴素的生活理念,用简化的方式看人生、生活。

对劳动的推崇在于,劳动使人表现出创造性、能动性,同时也提高自己。整个劳动过程是一种能力形成和提升的过程,它会显现出结果或成就,人因此获得一种特有的自我感、成就感与充实感。就劳动与人类处境的密切相关性而言,正是劳动使人们进入到非常具体的情境之中,劳动以现在进行的方式接纳、展示了过去的成果也创造了人类的未来,人在劳动中获得自己的位置以及在世界上存在。劳动还有益于培养和发展人的社会性情感,有助于人的社会性存在。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会带来力量、能力、安全。从人们的经验来看,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才可能从劳动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下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更多可供支配的时间,拥有更大的自由。劳动曾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劳动的价值,正如马克思的观点所揭示的,人类需求体系如衣、食、住等决定了劳动的重要性,劳动还产生快乐,不是简单运用肌肉或练习技艺的官能的快乐,而是参与创造世界的意识,劳动者还在其产品的反映中意识到了自己。劳动带来的平静安宁则来自于对某种存在之物的建设。

如果说推行劳动疗法是一种积极主张,保持无怨则是消极意义上对处境改善的主张。怨的意思有两种,一是怨恨,二是责怪,前者是情绪上的,后者是语言和行动上的。其中怨恨既有人们精神上的自我毒害,也有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长期积累的萎靡不振。怨恨从其心理状态来说,常常由嫉妒激发,它在有力量的人身上变成野心,在软弱的人身上则容易变成尖酸刻薄。怨恨中还有自责自怨,是对已有的和现有的生活的否定,是人们意愿上想成为与现在不同的另一个人。怨一定是在人际关系、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才有的情绪、言语、行动反映,人难免受苦,难免有怨,但是哲学家所主张的是,所有的受苦,都不能有怨。的确,其它的存在物可以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中茫然自得,人不同,他会为自己的命运有抱怨,有感叹。人对生命的抱怨来自于我们能看到生命的一切都是事实,不论这事实本身是否有意义,人必须承受,那些归于虚无主义的哀叹、埋怨、诅咒于事无补。既然如此,人们就得思寻无怨,免得以此来加重对生活的摧折。人们的受苦和抱怨与自审处境有关,在这点上,虚无主义鼓励了冷漠,人得有生命的强力,自己担当一切;虚无主义同时也培育了爱情,因为人只有凭借爱,才有力量承受一切。

人在世界与社会,他人的分离,其情形正如朱彝尊的小词所言:“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凉。”尽管每个人承受各自的凄凉单薄,那一场秋雨能在心头激荡的余响也只是“知道天凉好个秋”的叹息。今天,都市的繁荣,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进入陌生的城市,陌生人群中满是令人不安的体验和感觉。人逃离这种落寞的唯一去处是“爱”,只有要把孤独个体与包围他存在的一切紧紧相连,让世界赋予自我的不安进行抵抗。所以,爱的重要性强调对于建构处境伦理而言,是指人应当过充满爱的一生。

总的说来,人性的一个基本倾向,即在现实的处境中,都会有一种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研究处境伦理,就是探索这种可能路径,更重要的是唤醒自己去过真正的生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人的关怀与忧虑:处境伦理研究》(编号16FZX025)研究成果,作者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汕头大学卓越人才计划”优秀人才[STF18003])

学术速递

栏目主持:韩天琪

饶广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广告作为当代最活跃的传播方式之一,是反映文化演变的直接载体。新媒介的发展、消费模式的演变,都会极大地影响广告形态的变化,进而影响传播文化的基质。有关新媒介影响下广告变化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具体操作技巧,忽略了广告体裁演变这一更为深层的维度。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新媒介语境下广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出现了“泛广告化”。当前,泛广告化既表现在剧情广告、原生广告等新形态的大量涌现,也表现为植入广告、冠名赞助等传统泛广告形式的规模壮大。广告从新闻等信息类型中独立出来,成为独具风格的标出项,并形成其文本意向性。而泛广告化则让广告从传播活动标出项翻转为非标出项,成为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广告文本的意向性融合了新闻、MTV、微博等文本的意向性,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由此弥合了接收者想要接收的文本和强行植入的广告之间的分歧,推动了当代广告传播的全面演化。

——《论“泛广告化”传播的符号学机制》,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高速增长、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扩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中,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影响着他们的生存境遇,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凸显了他们与前辈群体的代际差异。但与此同时,新生代的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市场化推进导致的社会分化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也成为新生代无法回避的代际面貌之一。当今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青年的发展也迈入了新时期,均衡发展是新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载《社会学研究》,2019年03期

穆随心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从“契约社会”到新的“身份社会”的时代变迁,引发了倾斜性地保护劳动者的历史性诉求。现代西方社会学派认为,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符合实质正义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该原则不过是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自我修正与调适,其“底线”是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因而难以逃脱其固有的“资本意识形态藩篱”,无法从根本上体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价值逻辑,其结果必然是无法通达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目标。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的真实实践与超越,是基于追求自由自觉的劳动及劳动者本位的马克思“劳动者正义”观的证成、实现;是在真实改变社会现实、谋求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中,确立“劳动者利益本位”的历史生成性价值实践运动。

——《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探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阈》,载《文史哲》,2019年03期

高源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在20世纪海外汉学的译介与传播中,明清文学典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并在欧美世界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然而,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传播情况却较少有中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究其原因,北欧五国各自独立的语言系统及其根植于奥古斯丁—路德宗教传统的生活形态与汉语语境迥然不同。面对深刻的文化隔阂,如何将中国古典文学著作转换为当地喜闻乐见的文本形式并进行有效传播,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切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语境来考察明清古典文学的译介形态、发展脉络、基本特质及其传播模式,进而透过文本形式的分析来深入探讨其背后不同哲学思维与信仰价值的互动,将有助于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在北欧的译介规律和传播动态。

——《明清古典文学在北欧的译介与传播——兼论汉学诠释中哲学精神对译策略和风格的影响》,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